從傳統到西洋——
爪哇儀式服飾的變遷

楊芳綺

161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下簡稱 VOC）在巴達維亞（Batavia）設立總部。由於當地社會結構多元化，除了印尼本土居民外，還包括中國人、印度人、荷蘭人等不同社群。荷蘭人作爲統治階層，儘管人數較少，卻亟欲通過服裝規定來彰顯階級與權力，以此體現其統御的威嚴。

本文擬以本院典藏的兩件文物——十九世紀印尼〈拼布服〉與二十世紀印尼〈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爲核心，探討爪哇儀式服飾如何從傳統樣式過渡到西式服裝。過往研究普遍認爲現代爪哇儀式服飾深受歐洲影響，但對於歐洲服飾融入爪哇服飾系統的原因及其型制來源卻鮮少深入探討。本文旨在探討爪哇歐式服裝的可能來源與梳理其出現的時代脈絡，深入分析荷蘭殖民者對這一變遷所產生的關鍵影響。

首先，本文將論述一個較少受到關注的課題——服裝法律，並探討荷蘭人如何透過法律規範來維繫其統治。其次，文章將分析在 1799 年 VOC 倒閉後，荷蘭爲實行直接殖民統治，如何將爪哇貴族納入其行政系統，並將其轉變爲國家公務員。最後，本文將探討荷蘭人如何藉由服裝規範，將歐洲官員的服飾塑造成統治階級的象徵，同時透過授予爪哇皇室徽章等手段，促使他們認同歐洲的權威。直至二十世紀，隨著歐式服裝風潮席捲亞洲，爪哇貴族的傳統儀式服飾逐漸被歐式風格所取代。

荷蘭殖民地爪哇民族服裝的規定

服裝的功能不僅限於保暖、遮蔽身體，透過衣服的用料、材質、型式用以區辨不同的社會階級與品味。服裝不僅能表現個人與社會認同，還可以用來挑戰既有的社會分類。織品與服飾顯示了社會關係和文化再生產的多樣面貌，服裝的變遷具體呈現了社會變動與歷史的痕跡。地方服飾的變遷往往也是適應不同市場與國家體制的結果。[1]

依據 Marsely L. Kehoe 的研究，從 1647 年巴達維亞即有服飾與配件的法律規定，僅有 VOC 的最高領導階層、總督及其眷屬被允許穿著華美的紡織品、佩戴珍稀的珠寶。1680 年的法典（*1680 code*）的規定較爲模糊，只允許總督及理事會成員的妻子、孩子和遺孀被允許佩戴珠寶等。而 1754 年的《限制華麗和奢侈措施》（*Measures for Curbing Pomp and Circumstance*）是一套規範較爲全面的法律，如女性依社會地位決定佩戴合適尺寸和價值的珍珠，以及男性可以在外套上佩戴金或銀邊飾扣子，旨在規範公共場合可展示的奢華服儀。[2] 十七世紀的服裝相關法令，主要是透過禁奢法令，規範僅

有特定階級可以使用華美的織品與珍稀珠寶。Arnout van der Meer 指出，1900 年之前，荷蘭人將民族刻板印象納入法令和命令。依據警察法規（Police Regulations），殖民地的每個人都必須依照自己的民族和社會地位進行著裝，這些規定由各城市或地區自行頒布施行。直到 VOC 倒閉後，爲加強對殖民地的管理，1872 年頒布適用於整個殖民地的統一規定，任何人於公共場合若以與其民族或社會地位不符的裝束出現，將會受到處罰。[3]

荷蘭殖民的法律將人口劃分爲「歐洲人」、「本土居民」和「外國東方人」。外國東方人主要指中國人，也包括日本人、阿拉伯人等族群。每個族群受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並在不同的警察系統和法院中處理法律事務，居住區域也依照民族和職業劃分。如有旅行需求，則需獲得特別許可。爲了有效管理多元民族，服裝成爲一個直觀的識別工具，迅速辨別出個人的族群歸屬，並依據其所屬族群進行相應的管理措施。

1662 年，安德里斯· 貝克曼（Andries Beeckman，1628-1664，以下簡稱貝克曼）創作的〈巴達維亞景觀〉（圖 1-1）生動呈現了爪哇多元民族與服裝的描繪。雖然這幅作品並非來自現場寫生，但畫家對巴達維亞的研究十分深入，廣泛蒐集相關資料，因此仍是反映當時生活樣貌的重要素材。

畫面左側描繪了兩位中國商人起爭執的情景，一位身穿長衫，另一位則穿著黑色長袍和



圖 1-1　1662　貝克曼　巴達維亞景觀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藏　SK-A-19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d.rijksmuseum.nl/200108197（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白色綁腿。一群爪哇人正在踢球，他們多數上身赤裸，下身穿著素色紗籠。樹林中間有一名裹著白色頭巾、皮膚黝黑的男子，滿臉鬍鬚，穿著白色連身袍，左肩披著素色披巾，推測是孟加拉人。畫面中央描繪了一對異國伴侶散步的情景，後方有一位童僕撐著陽傘。男性爲衣著考究的荷蘭官員，身旁伴隨著一位深色皮膚的女性（圖 1-2）。這位女士的姿態與造型與



圖 1-2　1662　貝克曼　巴達維亞景觀　局部　混血女性



圖 2　1675～1725　繪者不詳　混血女性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NG-2016-37-14　取自該館官網：https://reurl.cc/daQmL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1-3　1662　貝克曼　巴達維亞景觀　局部　受洗的日本基督徒



圖 3　1656　貝克曼　受洗的日本基督徒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reurl.cc/gYRDoX（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1-4　1662　貝克曼　巴達維亞景觀　局部　爪哇人



圖 4　1595　林思索頓　《東印度水路誌》　馬來人與爪哇人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03.015.0168.0006　取自該館典藏網站：https://gov.tw/Pzk（Open Data），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水彩畫冊中的歐亞混血女性幾乎相同（圖 2）。畫面最右側則出現了一名身穿藍色和服的日本男子（圖 1-3），頭戴黑色寬沿帽，推測已皈依基督教。這一形象源自貝克曼的水彩畫冊（圖 3）。[4]

爪哇人在上述繪畫中的形象是上身裸裎，下著紗籠裙裝（圖 1-4）。根據安東尼 · 瑞德（Anthony Reid，1939-2025）的研究，東南亞出現縫製上衣時間較其它地區晚，探究其因，其一爲氣候炎熱，其二爲接受縫製技術較爲緩慢，第三則是獨特的身體觀，人們普遍認爲上身裸裎，以塗油、抹香作爲身體的裝飾，才是正式場合的裝扮。[5] 在 1595 年出版的林思索頓（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的《東印度水路誌》（*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6] 也可看到爪哇男性上身裸裎，下著圍裹式裙裝的例證，書中插圖右側描繪成對的〈爪哇人〉男性上身裸裎，僅以布巾遮蔽重要性徵，後腰插一刀劍（圖 4），因此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上身裸裎，下著紗籠裙裝是爪哇男性的普遍性穿著。

另一幅構圖與內容幾乎類似的畫作藏於荷蘭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7] 也是貝克曼所繪，畫面中央，一名爪哇男性身穿黑色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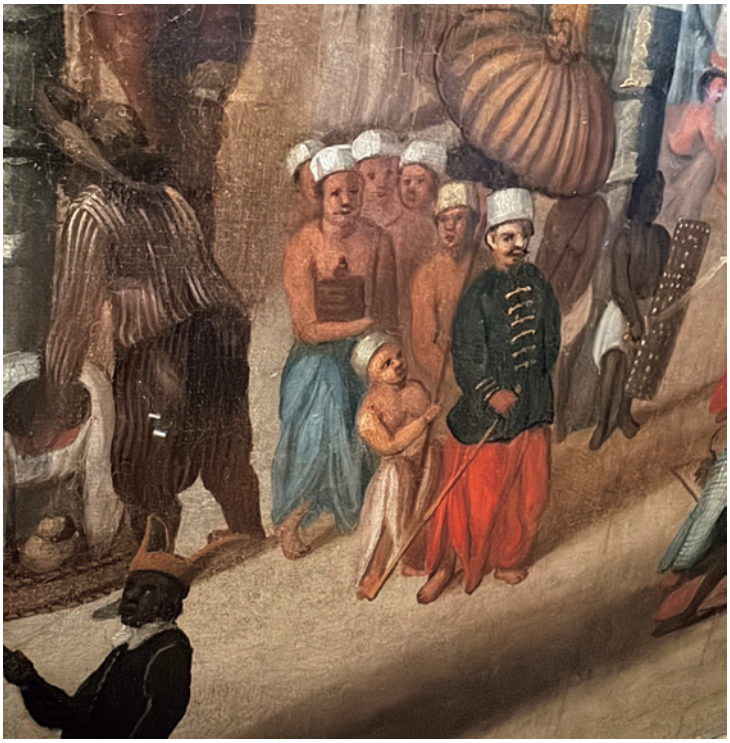


圖 5　1662　貝克曼　巴達維亞景觀　局部　穿著歐式服裝的爪哇貴族　荷蘭熱帶博物館藏　TM-118-167　取自該館官網：https://reurl.cc/rYYlpZ（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6　1656　貝克曼　穿著歐式服裝的爪哇貴族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reurl.cc/gYRDoX（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服裝，下著紅色紗籠，手持權杖（圖 5），其後方由奴僕手持陽傘，並有成列的隨從，類似的形象也可以在水彩畫冊找到母本（圖 6）。從僕人持陽傘與歐式服裝推測，這名男子應是爪哇貴族。出巡在外，爪哇貴族通常由僕役持拿傘蓋，其實際用途是遮蔽炙熱的驕陽，同時也是身分地位的代表，透過傘面的顏色來區辨不同的社會階級，平民則不被允許由僕役持傘，僅能自行持傘。而 VOC 在治理爪哇其間，也挪用爪哇貴族的象徵—傘蓋來展現權力，因此圖像 1-2 的荷蘭男性，應是屬於 VOC 的高階官員。[8]

儘管目前的研究尚無法確定十七世紀是否存在明確規範各族群必須穿著其傳統民族服飾的法律，僅有服裝禁奢的規定，然就現有圖像資料觀之，爪哇地區的貴族、富商與高階地方官員，爲了展現時尚品味，時常效仿歐洲殖民者之服飾風格。尤以歐式外套爲例，該類服飾多以價格高昂的黑色天鵝絨製成，並非一般社會大衆所能輕易負擔。透過穿著歐化服飾，爪哇精英階層得以彰顯其財力與審美品味，顯示出服裝作爲社會地位象徵的重要性。儘管當時亦有若干律令或禁奢規定試圖限制奢華服飾的使用，然其成效顯然有限，未能阻止人們對時尚之嚮往與模仿。實際上，早在十七世紀，即已可見爪哇貴族男性身著歐式上衣的圖像紀錄。至於此類歐式服飾何時廣泛流行於貴族階層，尚待進一步考察，並將於下章詳加論述。

爪哇王族儀式服裝的變遷

十七世紀初至十八世紀末，VOC 採行間接統治，由各民族領袖負責行政和稅收，實行分治。爲牟取最大的經濟利益，VOC 與爪哇傳統行政官僚合作，尊重爪哇貴族原有的社經地位與權力，並依賴其社會威望來管理爪哇人民。傳統的爪哇官僚菁英稱爲博雅易（priyayi），成員包含貴族、官員、行政幕僚，該團體的最高領導稱爲布帕蒂（bupati）。對普通爪哇人而言，貴族具有象徵性的權威，他們僅憑言說與領袖魅力，便可號召民衆自願提供服務。[9]

東印度公司解體後，1806 年至 1810 年間，法國短暫統治荷蘭王國。1808 年，荷蘭國王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1778-1846）命令赫爾曼．威廉．丹德爾（Herman Willem Daendels，1762-1818，以下簡稱丹德爾）治理爪哇，並重組行政體系。丹德爾不再依賴荷蘭的武力威嚇，也不同於過去的間接統治方式，而是將權力集中於中央，並將爪哇貴族納入國家公務體系。

丹德爾推崇直接統治，徹底改變了貴族的傳統權力架構，剝奪了爪哇貴族的領地所有權，使他們無法再要求人民提供免費勞務或繳納農作物。殖民地的荷蘭長官成爲強大的省級長官，而爪哇的布帕蒂則從貴族領主變成領取固定俸祿的公務員，成爲本土公務體系中最高級的官員。[10]

1808 年 7 月 28 日，殖民地總督丹德爾頒布了《儀式和禮儀法令》（*Edict on Ceremonial and Etiquette*），旨在強調荷蘭王國在殖民地的象徵性權力。此前，殖民地代表被稱爲「駐紮官」（Resident），爲提升其地位，丹德爾將這一職銜改爲「部長」（Minister）。此外，他還爲殖民地長官設計了新的官方服裝，[11] 具有拿破崙時代



圖 7　1838　Raden Sarief Bastaman Saleh　赫爾曼．威廉．丹德爾肖像　擔任總督期間（1808-1810）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SK-A-3790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d.rijksmuseum.nl/20027955（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8　1836　François Joseph Navez　萊昂納德．吉西尼肖像　擔任總督期間（1826-1830）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SK-A-3797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d.rijksmuseum.nl/20028656（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9　1836～1838　Jacob Spoel　查爾斯．斐迪南．帕胡德（Charles Ferdinand Pahud，1803-1873）肖像　擔任總督期間（1855-1861）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SK-A-3804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d.rijksmuseum.nl/20028663（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10　1885　哈門庫布烏諾七世肖像照　荷蘭皇家東南亞及加勒比海研究所藏　KITLV 10002　Kassian Céphas 攝　取自該所典藏網站：http://hdl.handle.net/1887.1/item:88945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風格的制服：頭戴黑色三角帽，帽緣飾有黑色邊框和徽章；上身穿著藍色高領大衣，繡有金色橄欖葉紋，配以金色鈕扣；下身著白色緊身褲，雙膝飾有金帶，搭配白色純絲高筒襪。[12] 制服顏色的選擇，尤其是藍色，推測與當時法國皇家代表顏色的象徵性有關。

從丹德爾的肖像畫觀察，他身著深藍色的高領上衣，領口、胸前、袖口均以金線繡有捲草花卉紋飾作爲裝飾（圖 7）。另一張萊昂納德．吉西尼（Léonard Pierre Joseph Burgrave du Bus de Gisignies，1780-1849）的肖像畫（圖 8），其於 1826 年至 1830 年擔任總督，服裝的型制大致相似，高領上衣的領口、開襟兩側、袖口繡滿金色草葉紋飾。即使其擔任總督時，已歷經法國、英國不同政權的治理，服裝的型態似乎未隨政權的異動，有重大的更迭，十九世紀初荷蘭重掌爪哇政權時，仍沿襲丹德爾時代的制服。隨著時代的變遷，從爪哇荷蘭總督肖像畫觀察，大約在 1855 之後，爪哇的總督服裝逐漸轉變爲黑色刺繡外套，但仍維持黑色三角帽，白色長褲等基本元素，這可能反映了當時審美風格的變化（圖 9）。

儘管法國對爪哇的統治僅持續四年（1806-1810），丹德爾頒布的《儀式和禮儀法令》對

印尼後來的正式服裝與儀式服飾產生了深遠影響。該法令所訂的殖民官員制服，影響了爪哇王族的儀式服裝，使其從傳統樣式轉變爲受歐式軍服影響的西式風格。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爪哇儀式服飾出現重要的轉折，從哈門庫布烏諾七世（Hamengku Buwono VII，1877-1921 在位）肖像照（圖 10），我們可發現其上半身穿著開襟的拼布外套，由不同的顏色三角形布料縫製而成，是爪哇傳統的儀式服飾。哈門庫布烏諾七世的下身穿著「督朵布」（dotdot），這是一種布幅較長且穿著方式較爲複雜的紗籠樣式。紗籠上裝飾著巴冷紋（parang），這是皇家禁紋，顯示出其尊貴的身份。他還內搭印度帕托拉（patola）長褲，這也是爪哇傳統服飾的一部分。

在爪哇傳統服飾中，除了剪裁與材質外，紗籠上的紋飾是區分階級的重要標誌。院藏的〈褐地巴冷紋蠟染裙布〉（圖 11）、〈白地蘇門紋蠟染裙布〉（圖 12），其中巴冷紋與蘇門紋（Semen）均是中爪哇皇室常見的專屬紋飾。[13]

上述的皇家拼布外袍，爲爪哇傳統的儀式服飾，類似的拼布外袍典藏於荷蘭熱帶博物館（圖 13），原由哈門庫布烏諾六世（Hamengku Buwono VI，1855-1877 在位）所擁有，可能由荷屬東印度家庭後代魏思敏女士（Geertruida Louisa Wieseman，1833-1909）製作敬獻予哈門庫布烏



圖 11-2　20 世紀早期　印尼爪哇　褐地巴冷紋蠟染裙布　局部



圖 11-1　20 世紀早期　印尼爪哇　褐地巴冷紋蠟染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249



圖 12-1　20 世紀初期　印尼爪哇　白地蘇門紋蠟染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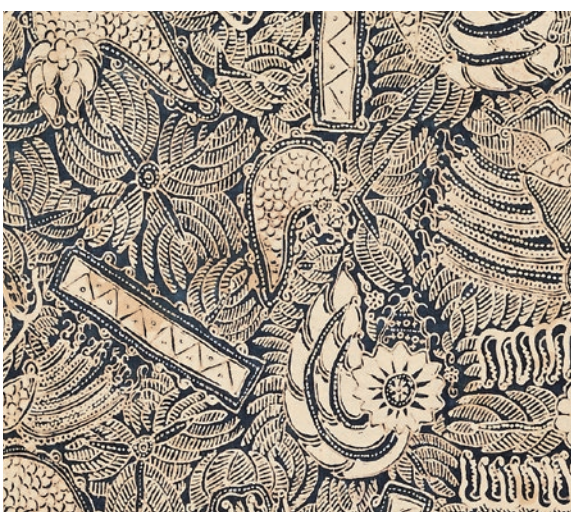


圖 12-2　20 世紀初期　印尼爪哇　白地蘇門紋蠟染裙布　局部



圖 13　19 世紀　拼布外袍　荷蘭熱帶博物館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https://reurl.cc/Qaa7a9（CC BY-SA 3.0），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14　19 世紀　印尼　拼布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001

諾六世，之後由哈門庫布烏諾七世（Hamengku Buwono VII，1877-1921 在位）傳承。

拼布外袍爲爪哇儀式服飾，拼布在中爪哇被認爲是神聖的，在蠟染亦有補綴紋，僅由高階官員穿著補綴紋（tambal 或 tambalan），通常被認爲具有神力，其起源可追溯到蒙古的薩滿穿著，或是東爪哇藤澤人（Tengger）印度教祭司穿著拼布紋樣的服飾。[14] 院藏有一件紅地拼布外袍（圖 14），由近千塊的三角形布片縫製而成，布片的種類主要爲染色的歐洲毛氈與印度繪染布，在彼時均是珍稀的織物，通常只有貴族或富商才有辦法擁有，本件作品推測可能是儀式服飾。

拼布外袍穿著的場合通常爲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儀式（Garebeg Mulud），[15] 這類的上衣被認爲有神奇的力量，其原型據傳是十五世紀淡目（Demak）清眞寺完成時，由先知穆罕默德賜予伊斯蘭九聖之一的蘇南 · 卡利亞加（Sunan Kalijaga，1460-?）。傳說在召開伊斯蘭教師會議時，從天而降以山羊皮包覆的包裹。蘇南 · 卡利亞加用山羊皮製作外套，稱安塔庫蘇瑪（Antakusuma），代表萬花之王的寓意。[16] 虔誠的蘇南 · 卡利亞加爲使伊斯蘭信仰可快速傳播，將前印度教王國滿者伯夷（Majapahit，1293-1527）的風俗納入伊斯蘭的日常事務。他將地方傳統、藝術融入儀式，使民眾信仰伊斯蘭。舉例而言他將滿者伯夷一年的首月聖餐，聯結到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儀式。幾世紀之後，拼布外套只有在爪哇馬塔蘭宮廷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儀式遊行穿著。

值得注意的是，爪哇蘇丹在穿著拼布外套時，從哈門庫布烏諾五世（Hamengku Buwono

V，1823-1826 在位）起即會佩戴八角星徽章，此徽章是 1808 年至 1811 年時任荷屬東印度公司總督丹德爾所贈予，爾後哈門庫布烏諾六世（圖 15）、哈門庫布烏諾七世（見圖 10）的肖像照，其胸前左上方亦有佩戴荷蘭殖民地長官贈予的八角星徽章。[17]

丹德爾推行的直接統治政策徹底改變了爪哇皇室的傳統權力架構。隨著《儀式和禮儀法令》的實施，爪哇皇室的地位逐漸削弱。丹德爾還賜予爪哇皇室荷蘭國王的徽章，此作法體現了帝國殖民治理中常見的象徵性的治理技術，藉由徽章作爲物質載體，結合授勳儀式與身體實踐，使其成爲政治意涵的具象表徵。政府頒授的徽章不僅標誌著特定的身分認同，其在被佩戴後轉化爲可視性的象徵物，具體化爲權力的代表。[18] 值得注意的是，爪哇皇室同意在其儀典服飾上佩戴該徽章，此舉可視爲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某種程度默認，亦進一步強化了荷蘭在當地所建構的主權象徵體系。

《儀式和禮儀法令》相關法規徹底改變了荷蘭代表在爪哇宮廷中的地位，反映出殖民統治的深遠影響。哈門庫布烏諾二世（Hamengku Buwono II，1811-1820 在位）曾強烈反對新的法令，但隨著時間推移，爪哇皇室逐漸適應變革。從哈門庫布烏諾六世前述已提及在儀式服飾仍穿著拼布服飾。但從哈門庫布烏諾六世其它的肖像照（見圖 15）中可以看出，皇室的公衆場合穿著已漸受歐式服飾的影響。他穿著黑色天鵝絨高領軍裝外套，腰線內縮下擺外擴的設計，領口、開襟兩側和袖口都繡滿金色花卉蔓草紋



圖 15　1865　哈門庫布烏諾六世肖像照　荷蘭皇家東南亞及加勒比海研究所藏　KITLV 4725　取自該所典藏網站：http://hdl.handle.net/1887.1/item:786707（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2 日。



圖 16　1817　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爪哇史》　爪哇女性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DS646.2 R13 1817 v.1

樣，並在左胸佩戴八角星與十字星勳章。

值得注意的是，哈門庫布烏諾六世的穿著呈現出歐洲與爪哇元素的混搭。他的上半身服飾顯示出歐洲軍裝的影響，而下半身則保留了傳統的督朵布和帕托拉長褲，反映出爪哇文化在殖民統治下的融合與變遷。

哈門庫布烏諾六世即位的時間爲 1855 年，其黑色金繡外袍與同年即位的荷蘭總督查爾斯 · 斐迪南 · 帕胡德（Charles Ferdinand Pahud，1855-1861 在位）肖像畫中的服飾風格十分相似（見圖 9），兩者都採用黑色絨布作爲主要材質，並以繡金裝飾。不過，荷蘭總督的外袍開襟兩側幾乎繡滿胸前，而爪哇蘇丹的黑色外袍則只繡有兩條花草紋飾。此外，荷蘭總督的黑色外袍腰線筆直垂至腰際，而爪哇蘇丹的外袍腰線內縮，下襬外擴的剪裁，推測一方面承襲是拼布外袍的收腰剪裁（見圖 13），另一方面讓人聯想到同時期歐洲女性外套腰線內縮的輪廓覆蓋至上臀處（圖 16），這可能是爲搭配裙裝使線條更爲流暢而產生的設計。這些變化顯示出歐洲服飾風格在爪哇宮廷中的深遠影響。直到二十世紀初，隨著歐式服裝風潮席捲亞洲，哈門庫布烏諾八世（Hamengku Buwono VIII，1921-1939 在位）在儀式中改變原有穿著拼布上衣的傳統，改穿黑色絲絨外套，其造型原型可追溯至歐洲軍裝風格（圖 17），並將其正式納入宮廷儀式服飾體系之中。[19]



圖 17　年代不詳　哈門庫布烏諾八世肖像照　© 紐約公共圖書館藏 NYPL 13-1887-440

綜上所述，丹德爾爲實現對爪哇的直接控制，透過服儀法令的相關規定，授予其荷蘭王國的徽章，而爪哇王族佩戴上徽章的同時，某種程度也默認其權威性。而丹德爾刻意推行的歐式軍裝，歷經過一百年的推行與強調荷蘭統治的權威性，到二十世紀初最終也成爲日惹蘇丹的儀式服飾。院藏的二十世紀初〈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圖 18），立領、腰線內縮下擺外擴的剪裁，領口、袖口，開襟兩側、外套下緣底部以金線繡出華美且細密的折枝花卉，其歐式剪裁與金繡的裝飾方式可能源自十九世紀初的歐式軍裝（見圖 9）。

結論

本文透過梳理荷蘭統治時期對爪哇地區所制定之服儀規範，探討殖民政權如何藉由儀式與禮儀法令建構並維繫族群與階級間的社會秩序，並進一步突顯服裝於殖民治理與統御權力中的關鍵角色。1799 年 VOC 解散後，荷蘭轉向直接殖民統治，並於 1808 年由時任殖民地總督丹德爾頒布《儀式與禮儀法令》，對爪哇傳統服飾體系產生深遠影響。在其治理下，荷蘭殖



圖 18　20 世紀　印尼　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　南購織 000531

民政府建立了爪哇荷蘭總督制服的樣式，並推行中央集權體制，使傳統爪哇貴族轉化爲殖民體制下的官僚角色。

作爲象徵性統治技術之一，丹德爾進一步將荷蘭國王之徽章授予爪哇皇室，以徽章贈與與禮儀實踐方式鞏固其統治正當性。此舉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即可見端倪，爪哇皇族佩戴西式徽章之攝影作品逐漸出現，至十九世紀中葉，更有爪哇蘇丹穿著歐式軍裝之影像流傳。本文透過服裝法律的規範、歷任爪哇荷蘭總督的肖像畫比對，追溯院藏二十世紀印尼〈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的風格來源，其風格來源可能與丹德爾的《儀式和禮儀法令》有關，該法令對於殖民地領導者的服儀已有明確的規範，反映殖民體制下權力階層的視覺再現。進入二十世紀，隨著歐洲服飾潮流在亞洲廣泛流行，爪哇貴族階層之傳統儀式服飾亦逐步受到西式樣式取代。院藏之十九世紀印尼〈拼布服〉與二十世紀印尼〈黑地金線刺繡毛外套〉，正可視爲爪哇儀式服飾自本地傳統過渡至西化風格的具體物證，體現殖民語境下物質文化的變遷與重構。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何兆華，〈人觀、歷史與服飾：導論〉，《民俗曲藝》，216 期（2022.6），頁 1-6。

2. Marsely L. Kehoe, “Dutch Batavia: Exposing the Hierarchy of the Dutch Colonial City,” *Journal of Historians of Netherlandish Art* 7, no. 1 (Winter 2015): 1-3, 17-22, accessed August 19, 2025, doi: 10.5092/jhna.2015.7.1.3. 1647 年的服裝法律規定，原始文獻參考 Jacobus Anne van der Chijs,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85-1900), 2: 111. 1680 年的禁奢命令，原始文獻參考 Van der Chijs, *Plakaatboek*, 3: 47-48. 1754 年的《限制華麗和奢侈措施》，原始文獻參考 Van der Chijs, *Plakaatboek*, 6: 773-95.
3. Arnout van der Meer, “Contesting Sartorial Hierarchies: From Ethnic Stereotypes to National Dress,” in *Performing Power: Cultural Hegemony,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Indonesi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112. 1872 年原始文獻 *Staatsblad*, no. 110 and 111 (1872).
4. 有關〈巴達維亞景觀〉所描繪的服飾與圖像來源討論，詳請參見「荷蘭國家博物館」官網圖錄說明介紹 https://www.rijksmuseum.nl/nl/collectie/SK-A-19/catalogus-entry?pdfView=False（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5 日）。貝克曼的水彩畫冊，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資料庫》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1522242k.r=Andries%20Beeckman?rk=21459;2（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15 日）。
5.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7.
6. 林思索頓於葡屬印度（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果亞（Goa）停留 5 年，期間擔任葡萄牙駐果亞邦大主教（Archbishop）的書記，因此有機會閱覽、抄寫有關葡萄牙東印度地區的文獻資料。後來回到荷蘭，於 1595 年完成此書，隔年於阿姆斯特丹出版。有關此書介紹，參閱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頁 28-33。
7. 貝克曼所繪製的《巴達維亞景觀》有 2 個版本，第一個版本現存於荷蘭國家博物館（inv. no. SK-A-19），1663 年起懸掛於阿姆斯特丹東印度公司大廳，由 Arnold de Valmingh van Outshoorn 向貝克曼訂製。另一個版本現存於荷蘭熱帶博物館（inv. no. TM-118-167），由 Arnold de Valmingh van Outshoorn 向貝克曼訂製。
8. L. Kehoe, “Dutch Batavia,” 1-3.
9. 博雅易（priyayi）從字面解釋為品德高尚的文人，布帕蒂（bupati）則是類似縣長的職位，其為地方爪哇人與殖民政府的重要聯繫，雖然在行政體系臣屬於荷蘭人，但是在爪哇社群是位於社會階級的最頂端。相關資訊參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陳信宏譯，《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臺北：衛城出版，2024），頁 174-179；van der Meer, “Contesting Sartorial Hierarchies,” 22-24.
10. van der Meer, “Contesting Sartorial Hierarchies,” 27.
11. 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Governors）的儀式服裝似無定式，多為素色及膝長袍，較常見的為黑、藍、褐色，較少見在高領領口以繡金作為裝飾，詳參見歷任總督肖像，《維基百科》i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governors_of_the_Dutch_East_Indies.（檢索日期：2025 年 8 月 19 日）。
12. Peter Carey, “Revolutionary Europ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Java’s Old Order, 1808-1830,” *HISTO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Education* 12, no. 2 (2011): 301. 經查證原文並未指出軍服為拿破崙風格，應為作者 Peter Gray 個人詮釋，詳參見原始文獻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15: 63-65.
13. 巴冷紋（parang）為蘇丹家族專屬紋飾，*parang* 為刀之意，圖像上呈現破碎的刀紋，象徵為護佑穿戴者而產生的裂痕，具有趨吉避凶之效。蘇門紋（Semen）具生長、發芽之意，通常為聖山（Mount Meru）與金翅鳥（Garuda）等紋飾的結組，象徵爪哇的宇宙觀。參考楊芳綺，〈從文獻看印尼紗籠與蠟染紋飾流變〉，《藝術評論》，41 期（2021.7），頁 183-184。
14. 哈門庫布烏諾五世（Z.H. Hamengku Buwono V 1822-1855）的畫像也穿著拼布外袍，應是傳承自祖輩。參閱 Alit Djajasoebrata, *Flowers from Universe: Textile from Java* (Edam: LM Publishers, 2018), 60; Jakl, Hoogervorst, “Custom, Combat, Ceremony: Java and the Indo-Persian Textile Trad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no. 103 (2017): 218.
15. 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儀式（Garebeg Mulud）為日惹、梭羅宮廷每年三次的慶典，與伊斯蘭的先知誕辰（Mawlid al-Nabī/birthday of the Prophet）、開齋節（Īd al-Fiṭr/festival of the breaking of the fast）與宰牲節（‘Īd al-Aḍḥā/sacrificial feast）三個節慶同時慶祝。詳參見 Brill online, August 22, 2025,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aedia-of-islam-3/*-COM_27375。Kyai 有修士、教師之意。
16. Itie van Hout, *Indonesian Textiles at the Tropenmuseum* (Edam: LM Publishers, 2017), 110-111. Antakusuma 意指源至聖蛇 Anta，由多個布片縫製而成的衣服。參閱 Djajasoebrata, *Flowers from Universe: Textile from Java*, 60, 69, 125-126.
17. Peter Carey, “Revolutionary Europ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Java’s Old Order, 1808-1830,” 301.
18. 有關殖民帝國徽章受贈的相關研究，參見謝仕淵，〈「今後凡有勤務者須帶徽章」── 1905 年「保正甲長徽章」之研究〉，《歷史臺灣》，7 期（2014.5），頁 51-72。.
19. 參閱 Djajasoebrata, *Flowers from Universe: Textile from Java*, 60, 69